

## 「文化研究」的展望與回望

### Prospects and Retrospects of Cultural Studies

蔡孟哲\*

Meng-Che TSAI

我大學本科是會計系並輔修社會學，後來才就讀清大社會所，而在這個階段誤打誤撞、因緣際會地與文化研究相遇。碩士畢業工作幾年後又轉進完全陌生的中文領域攻讀博士，或許我的跨領域求學路徑本身就像在進行一項文化研究的實驗。但和其他夥伴接觸文化研究的過程不太一樣，我在2003—2007年期間主要是以工讀生的身分參與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的活動，只有零星地旁聽陳光興的課程，而沒有真正修習文化研究相關課程（就像雖然我碩士論文處理同志議題，但當時也沒有上過同志或性／別研究的相關課程），我的文化研究經驗或感覺比較是在課後的喝酒聊天、協助辦研討會和自己胡亂讀書的過程中浮現。現在回想起當年會受到文化研究的吸引，或許是因為自己的研究動力及欲望是源於身為性少數的生命經驗，而文化研究經常針對當代新興議題提出不同的認識與分析視角，並對弱勢邊緣或敏感對立課題有著關懷與介入傾向，以及在研究方法上反思學術理論與政治實踐問題，就如同英國文化研究學者John Storey是以學術實踐的政治與作為政治的學術實踐來標誌文化研究的特點那樣。我當時的碩士研究探討男同志社群內部新浮現的情欲類型及情感關係，探究鑲嵌於臺灣特定社會脈絡的同志情欲如何被生產、流通、詮釋與實踐，也反身批判了貼近自身情感與思想的處境知識。到了博士階段，我通過歷史文獻與文學材料的溯源並探索從民國初年到新世紀之後「同性戀認識論」轉變的歷史

---

投稿日期：2019年9月25日。接受刊登日期：2019年10月25日。

\*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文化研究》執行編輯。

電子信箱：wyvernteacher@gmail.com

過程及其關係性，以重新思考性、性別及不同社會關係的連結，一方面回應同志不只是晚近西方舶來品的觀點，而是有其知識傳統及歷史縱深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也嘗試另闢蹊徑分析華文語境同志歷史的變化更迭，並通過同志文學及文化強調倫理面向的重要性。在研習與進行性 / 別研究的過程中，我時而經驗到面對研究對象與現象時的各種矛盾張力，時而感受到想要發出異議的焦慮與挫敗，總而言之，這十多年來沉浸在文化研究是一次次苦樂摻雜的過程。

上述我從回顧個人的學思歷程說明文化研究在臺灣的發展其實可能撐開了一個特殊的空間，讓我這種「半途出家」的學生能夠在裡頭自由地吸收需要的知識、進行喜愛的研究；或許可以這麼說，我是在文化研究也還在探問自身是什麼的情況下（也因此有了這麼些個彈性），參與仍處在變動狀態、還未穩定，甚至是拒絕被界定的發展過程。然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下臺灣的學術生產及高等教育發展形勢，可以視為知識或思想運動的文化研究也得面臨專業化、體制化和指標化的衝擊和挑戰，過往形構另類知識主體的自主性空間逐漸縮窄。以下我主要想藉由回望自己參與和觀察清大亞太 / 文化研究室的工作過程——特別是在教學規劃和設計的制度性面向——來展開反思及展望，換句話說，我想探討的是所謂文化研究的「教學的文化政治」。文化研究是否要以學科建制化來實踐其知識計畫，在過往海內外的發展中內部一直都有所爭論，在臺灣的情況則有其歷史特定性及偶然性，而我比較是想從這個教學實踐的建制化過程出發——教學實踐一直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關懷，無論是最初1950—1960年代在英國發展時的工人成人教育課程，或者後來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的教學機構設立等等——來討論文化研究的本體論、知識論及方法論三個層面，當然這三者是相互關聯、連動的，例如在探問本體範疇時必然會觸及知識構作和研究取徑的問題。（以下的想法受惠於碩士班時期與陳光興、以及博士班時期與三位召集人劉人鵬、李卓穎和陳瑞樺一起工作的累積）

從2003年起，清大亞太 / 文化研究室的重點工作之一是規劃和開設臺灣聯合大學系統跨校學分學程與清大人社院學士班文化研究學程的課程而

在每年召開的學程說明會以及文化研究導論課堂上，我們總是不意外地會一直被學生追問：「文化研究是什麼？」在2014年面對學士班課程轉型所帶出的學程存續議題時，我們是透過以下五點來辯護文化研究在臺灣的特色並勾勒其本體，這五點也是文化研究在課程設計和教學安排上想要培養學生的能力和技藝：

- (一) 跨學科的科際整合；
- (二) 具有社會關懷的人文精神，參與及介入社會過程、連結學院與社會；
- (三) 強調有理論基礎的批判、反思性分析；
- (四) 掌握文化的特定性及歷史脈絡化的解釋；
- (五) 亞際文化研究的開展與亞洲各地歷史文化資源的轉化。

然而，多年來學生對於文化研究是什麼的疑惑未減反增，這個現象凸顯的既是原有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範疇劃分得不斷強化而非鬆動（若沒有壁壘分明的學科界線又何嘗需要跨越），也是學生對於大學基礎知識和方法的學習焦慮（近年來高教紛紛強調要跨域連結卻使學生擔心不夠專業）。文化研究是在破與立的訓練過程裡，推動學生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構作，其強調接合(articulate)的潛力，也企圖串連既有學科的專業特色，讓學生更能觸類旁通，但它卻也因其知識特性而經常讓學生感到無所適從——我該讀哪一些所謂的學科祖師或經典文本呢？

隨著社會整體情勢的轉變，現在學生迫切面對的挑戰是，如何轉化學院知識到業界求職謀生，雖然大學之道並非在於單純的技職訓練，而在於培養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這已是近年來高等教育的現況和挑戰。即便有種種結構和制度上的問題和困難，而非來自於對文化研究自身的質疑，文化研究也難以自外於局勢的變動而有所調整。若以文化研究課程規劃作為一種展望或是回應少子化與全球化而轉變的高教趨勢，未來或許要加入結合理論和應用、論述和實踐的課程設計來裝備學生，並藉此回應她們的疑惑。例如我曾根據前輩思考的軌跡設想了二類課程：「編輯理論和實務」，將編輯視為知識生產或資訊匯集環節的重要守門人，學習如何在編輯這個位置上操作文化研究的種種理念；以及「文化批評與文藝實踐」，

或可追索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因報刊雜誌興盛而竄起的多樣文類及論述樣態，或探索臺灣解嚴前後百花齊放的副刊文藝批評和新生的各類文藝雜誌，如何可能構連近年來社群網路發達後的文化生產和影響力，在此脈絡下進行文化批評的思考和寫作，進而突破傳統報刊書籍編輯或寫手的侷限，開創諸如臉書小編、網站平台編輯或是企業情報員等新型工作樣態。

我藉由簡略回顧文化研究在清大體制化過程所遭遇到的困難，來描繪其可能的形貌，並以課程規劃的設想來討論如何因應時代變化的知識轉變。自2003年迄今，我分別在碩士班和博士班數次擔任「文化研究導論」課程助教，而透過回顧與比較陳光興和王智明兩位老師相隔十年的課程說明，或許更可以看出這個知識移動的軌跡（另一種做法則是脈絡化地分析文化研究教學或出版的閱讀讀本）。以下分別是兩人課綱的部分摘要：

文化研究強調具有開放性的跨學門科際整合，認為正在快速變動的世界已經無法以單一學科的方法來理解，必須透過連結各個學科中所提煉出來的尖端知識，才能提供有力的解釋，也才有可能想像介入這個變動過程。[……]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依據其已經建立起來的認識論，文化研究在當前知識狀況所處的位置，就是在保留與開拓批判思維的。因此，閱讀的資源必然會是強調歷史意識的，跨學科領域的，跨越地理空間的，將學術與社會的分析與關切能夠連結起來。（陳光興2004年的課程說明）

本課程旨在介紹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方法以及最近的研究概況，並藉由閱讀、討論與書寫等練習，訓練學生獨立思考以及批判思辨的能力。本課程將文化研究定位為，內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與生活狀況所發展出來的批判學術，其主要的思想根基為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其對商品、交換與原始積累的分析——以及從亞洲現代性經驗所提煉出來的第三世界精神與亞際思考。本課程亦以當代臺灣正在發生的社會與文化現象為例，來說明文化研究的方法學，並將這樣的思考回歸知識生產的核心場景——高教學院。（王智明2014年的課程說明）

對我來說，陳光興強調的歷史化、跨領域和跨疆界的視野十餘年來已沉澱為王智明課綱中毋須多加說明的知識基礎，就像資本主義商品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2014年也已是不言自明的重要變項（但我不是在說就不用繼續分析探討），重要的是如何透過文化研究學者們嘗試實驗和逐步成形的知識概念和方法來分析當前的關鍵議題：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或左

airiti

翼批判圈的理論系統，另一方面是以第三世界亞際形成一種知識計畫的跨界操作。但是，我們要如何從在地思考他方？如何面對各地獨特的歷史文化（國族框架）及主體能動力？如何接合與為己所用或形成相互參照？如何開展不同區域民衆的連結？如何接合起區域的歷史關係性？如何擴大與深化知識的視野？如何克服語言障礙？這些也是我在博士研究中試圖提出「第三世界同性戀認識論」時所碰到的難題，縱使身處殖民與冷戰雙重效應的臺灣，作為研究者享有諸多寶貴的思想資源與養分，但是歷史政治過程所形成的種種知識屏障仍有待我們持續跨越與克服。

此外，我在參與課程教學、編輯出版、策展、專題演講、工作坊和研討會的籌畫過程中體會到，文化研究的知識生產同時是介入性、行動性與政治性的，不僅重視紀錄、反思與拓展社會實踐，也關注理論與實作、學術與運動之間的張力與矛盾，甚至企圖打破兩者之間的區別，強調知識生產本身也是一種運動實踐。以我的經驗來看，文化研究迷人且巔危之處就在於其無懼於反思社會實踐的有限與侷限，反而不斷地接受運動的挑戰與論辯。只是近年來各種不可預期的社會事件，凸顯運動主體及社會的鬥爭改造不只在知識層面的困難重重，有時更連繫了人身與精神狀態的岌岌可危。我想起故友鄭聖勳曾回應我研究的一段話：「或許不是強調運動路線的不同，而是在面對受創歷史記憶的精神態度時，希望運動者的苦難是可以稍被緩解的，重要的是如何面對自身痛苦以及歷史的狀態」。聖勳深具倫理關懷的提醒不僅為我（們）開啓了文化研究的一道思想與情感的開口，也帶出如何進行一項好的文化研究的方法論思考。

簡略地說，文化研究沒有發展自身特有的方法論（這或許如同學科建制化都不是文化研究的主要欲望，也或許是馨文與佩甄仍持續探問的「以誰作為方法」），或者說，不同研究者在面對新的研究議題時所採用或新創的方法學，本身也是文化研究構成與發展的一種特色（例如性／別研究、國族想像、再現政治等研究成果）。若從台聯大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方法論課程規劃來看，文化研究是從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媒體傳播、文學及藝術研究等學科來挪用它們已經發展出的研究取

徑。然而，方法論所關聯到的不僅是知識生產的觀點立場、倫理及政治等面向，還有認識論的問題，如果沒有一套屬於文化研究的方法學，那麼要如何操作才能兼顧文化研究問題意識的在地性及歷史性，包括同樣重要的政治性意涵？要如何在亞際層次操作文化研究，以及以文化研究來操作亞際議題呢？對歷史專業來說，文化研究強調的歷史脈絡化可能不算什麼歷史，就像文化研究重視地域的文化獨特性，或許也難以面對民族誌關於深描與田野厚度的質疑，以及社會學重視的代表性的信效度標準，即便這些研究同樣關注日常生活、權力運作、主體性與政治性等等課題。關於這些提問我目前沒有進一步的想法，只是在想：或許沒有特定的方法論，也就毋須依照既有學科規範來按圖索驥地從事研究，進而能夠摸索出不是跨學科或跨領域的，反而是不同學科之間如何彼此連結、共同生成的操作方式及發展契機。